

中国传统创新意识发微

李光福

[提 要] 中国人自古崇尚创新，其创新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蕴和独特的逻辑。天地之化日新、与时偕行、变则通、人有日新之命等，构成传统创新意识的哲学理据和主要内容。该意识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传承不息，是推动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动力，对今天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[关键词] 创新意识 日新 与时偕行 变则通

[中图分类号] B22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0-114X (2010) 01-0073-07

时常听人说，传统国人消极、保守，缺乏创新精神，中华文化创新意识淡薄。这其实不准确，至少片面。中国人自古崇尚创新，极富创新意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？本文拟深入中华文化，按照传统国人的思维逻辑，揭示和彰显中国传统的创新意识。

一、天地之化日新

与现代人从人类社会或人自身寻找人行为的依据不同，传统中国人确信人来自宇宙，人类的根在宇宙，而倾向于从宇宙找寻人行为的根据，基于宇宙论来说明人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在传统国人看来，人类所依托的宇宙是一个生机盎然、变化日新的洪流。古老的《周易》就蕴涵这种看法。明末清初金圣叹释“易”云：“‘易’乃大千之变易。大千本无一有，更立不定，‘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’之谓也”^①。“易”指宇宙的变化，宇宙永远处于不断更新的变化之中。而作为《周易》之重要组成的《易传》则称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，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（《周易·乾·彖》），“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），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，生生之谓易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。这是说，由于阴阳或乾坤的交互作用，宇宙充满生机，不断创造新事物，万物层出不穷，日新月异，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，气象万千。生生不息，不断创新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定性。《周易》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、不断创新的宇宙。

这一认为宇宙变化日新的观念，在中国历史中持续传承。魏晋郭象视宇宙为一变化日新，自

然而然的过程，说“日夜相代，代故以新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变化日新，与时俱往，何物萌之哉？自然而然耳”（《庄子注·齐物论》）。唐孔颖达言“自天地开辟，阴阳运行，寒暑迭来，日月更出，孚萌庶类，亭毒群品，新新不停，生生相续”^②。世界上的事物都处在“新新不停，生生相续”的进程中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提出“天地之德不易，而天地之化日新”（《思问录·外篇》）的论断，强调天地的生生之德不变，天地万物的变化日新月异。在王夫之眼中，世界的变化日新一方面表现为“谢故以生新”^③，“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”^④，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，新事物不断代替旧事物；另一方面表现为“质日代而形如一”（《思问录·外篇》），事物形式依旧，但实质已发生更新。他指出，有些事物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改变，其实它的内容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更新。今日之物从形式上看与昨日之物没有两样，但在内容上看已不是昨日之物。他举例说“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，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”“江河之水今犹古也，而非今水之即古水；灯烛之光昨犹今也，而非昨火之即今火。水火近而易知，日月远而不察耳。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知也。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未知也。人见形之不变，而不知其质之已迁，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，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，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！”（《思问录·外篇》）大至日月，小至人的毛发、细胞，都在发生着更新。因此，从总体上看，宇宙是生生不息，变化日新的大流。在时间的流动中，每一时刻都有创造、创新“未生之天地，今日是也；已生之天地，今日是也。唯其日生，故前无不生，后无不生”^⑤。王夫之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变化日新、不断创新的宇宙，世界上的事物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^⑥。一旦不能更新，就必定走向死亡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，虽其未消，亦槁而死”（《思问录·外篇》）。

承认宇宙变化日新几乎是传统国人的一个共识。但传统国人并不像古希腊的“爱智者”那样探索自然，思考宇宙只是源于对自然的“惊异”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他们思索宇宙是为了寻求人行为的根据和准则，探求宇宙法则是为了说明做人的道理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^⑦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。这一宇宙变化日新的观念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在于，为传统国人的现实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根据。有什么样的宇宙观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样式。传统国人宇宙变化日新的信念，实际孕育着他们的创新意识。这一宇宙观能够激发传统国人的创新冲动，鼓励人们以自身的创新回应宇宙的创新，推动人们将宇宙的创新精神落实于社会的各个方面，使人们比较容易选择和接受变革创新，相信推陈出新的必然性。传统国人正是基于这一宇宙观，以与生气勃勃、洋溢创新精神的宇宙相一致，才积极倡导开创新局面，日新其德，日新其业。《易传》主张置身于宇宙变化创新的大流，人类要分享宇宙的创新力量，“与天地合其德”（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），以人的创新来承继宇宙之创新，而成就人类生命之价值“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）王夫之倡导人与世界的变化日新相协调“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，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。”^⑧人充分体现宇宙之“日新”精神，不断进步，不断改变和丰富自身“日新盛德，乾之道，天之化也。人能体之，所知所能，皆以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，则后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，则德日盛矣。”^⑨北宋王安石不仅将新陈代谢看作是自然的法则，而且视为人类社会的法则，肯定变法革新的合理性“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。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”^⑩“新故相除”即新旧交替，新的代替旧的。由此可见，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深切感受到了宇宙变化日新的脉动，从中获得创新的信心和力量的。中华民族的一些杰出志士是从宇宙的变化日新获得感召，而投身各种创新实践，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的。应该说，传统国人天地之化日新的宇宙观是一种支持创新的宇宙观。

二、与时偕行

传统国人不仅感受到宇宙的变化日新，而且发现这种变化是因时而变“与时偕行”的。《易传》有明确的表述。如言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”（《周易·丰·彖》）“天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（《周易·随·彖》）天下万物的变化都是依从一定的时令而进行的，因时而变是宇宙的一大规则。万物因时而变，而人当如何？信奉“天人合一”哲学的古人给出的答案是：与宇宙的节律协调，顺应时势的变化，以变应变，“与时偕行”。在古人那里，“与时偕行”的“时”并不单指时间、时令，还指时机、环境和条件，泛指客观事物的现实状态及其发展趋势。而人必须“与时偕行”的原因在于，不断变化的客观时势对于人具有不可抗拒的第一性和先在性，人从根本上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，选择客观时势的自由。面对客观时势，人所能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，就是直面而因应之。人只能立足于现实的时势而进行自己的选择，只能顺应时势的变化，借助时势变化所提供的机会和条件而寻求相应的发展。因此，《易传》说“损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（《周易·损·彖》）在天地之间，事物的增减、盈亏，都有适宜的时机和条件。人要审时度势，应时损益。

在《周易》体系中，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、每一爻都代表着一个特殊的“时”。这些“时”连起来是事物的发展过程，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点则是一“时”。“时”是变化的形式或特殊表现，事物运动变化以“时”的形式展现出来。每一“时”都是在特定空间展现的特殊情境，这种情境下含有适合它自身的变动和形势。人若顺应这种变动和形势而采取适当的措施，作出适当的反应，则称之为“得时”，反之就是“失时”。“得时”则吉利，“失时”则凶险。行为者一定要研究所面临的特定情境作出合适的调整，以“得时”。所以《易传》说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”（《周易·艮·彖》）。呼吁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，“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”（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）。

从时势的变化进而提出人必须“与时偕行”，是《周易》的一个重要思想。其实，这也是古人普遍认同的理念。在先秦，《管子》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从实际出发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：“随时而变，因俗而动”（《管子·正世》）。西汉《盐铁论》言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世而制”（《盐铁论·忧边》）。郭象称“时移世异，礼亦宜变”（《庄子注·天运》）。北宋程颐认为，“随时变易”是宇宙的普遍法则“凡天地所生之物，虽山岳之坚厚，未有能不变者也。……唯随时变易，乃常道也”^①。要求人“随时变易”：“君子之道，随时而动，从宜适变，不可为典要”^②。在传统国人的头脑中，“随时而变”、“因时而变”、“随时变易”等，与“与时偕行”是一个意思。它不仅是自然界、也是人类社会的准则。

“与时偕行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。今天我们说，与时俱进的本质是开拓创新，而中国古代的哲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变革创新是“与时偕行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在程颐看来，变革创新是“与时偕行”的必然体现。他在解释《周易》“革”卦时说“推革之道，极乎天地变易、时运终始也。……时运既终，必有革而新之者”。“天道变改，世故迁易，革之至大也”^③。在王夫之的观念中，“与时偕行”即“更新而趣时”。他说“道莫盛于趣时。……时驰于前，不知乘以有功，逮其失而后继之以悔，及其悔而当前之时又失矣。……往而即新，以尽其乾惕，然后得吉焉。……更新而趣时尔”（《思问录·内篇》）。他告诫人们应当把握时机，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。只有趋时更新，有所创新，才能取得成功。

面对宇宙与社会不断变化的时势，人应“与时偕行”，变革创新，是传统国人思维的一个基本逻辑。立足于宇宙、社会变化的大背景，从因时而变、与时俱进的视角论证变革创新，是传统国人的一大特点。一旦敏锐地觉察到时势的变化，便积极谋求变革创新。中国的春节习俗就有这方面的寓意。王安石《元日》诗云：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^⑭。说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家都在太阳初升，阳光灿烂之时，拿着新的桃符换去旧的桃符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。春节这一天的“瞳瞳日”是时势，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是人们“与时偕行”的举动，寓意除旧布新。“与时偕行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一座大海上的航标，一直导引着国人顺应时势的变化，积极进取，变革创新。清末康有为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就依照“与时偕行”的逻辑，大声疾呼：“方今当数千年之变局，环数十国之觊觎，既古史所未闻，亦非旧法所能治。……故今当以开创之世治天下，不当以守成之世治天下。盖开创则更定百度，尽涤旧习，而气象维新”^⑮。可以说，秉持“与时偕行”的理念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断谋求变革创新，保持旺盛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三、变则通

在现实中，传统国人普遍认可变革创新。《易传》认为上古圣人都是中华文明肇端的大发明家。它列举伏羲创八卦，作网罗；神农（炎帝）造耒耜，开集市；黄帝、尧、舜等制衣裳，为舟楫，发明杵臼、弓矢、宫室、棺槨、文字；赞美“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的丰功伟绩。“通其变”指对前人创造的变通革新，“神而化之”则是形容古圣的神奇创新。《易传》奉圣人为发明创新的典范，说“备物致用，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）。这对后人的创新、特别是科技创新具有激励和保护作用。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，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，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文明发明创新的始祖。中国人对炎黄二帝的崇拜，体现的是对创新的推崇。

“革故鼎新”是沿用至今的一个成语。若溯其源，须回到《周易》。《易经》有“革”、“鼎”二卦，《易传》称：“‘革’，去故也；‘鼎’，取新也”（《周易·杂卦》）。“革”卦的卦画为“下离上兑”。其《彖》曰：“‘革’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‘革’”（《周易·革·彖》）。这是以水火相灭，二女相争来解释“革”卦。按此说法，“革”即对立面相排斥，使原有的局面发生改变。王夫之释之云：“其义为改也，变也。……物之不用其已然，而以改革为用者也。故曰‘革故’也”^⑯。“革”的含义是改变、变革旧物，但革旧必须布新。所以《序卦》言：“革物者，莫若‘鼎’，故受之以‘鼎’”（《周易·序卦》）。“革”卦之后便是“鼎”卦。“鼎”卦的卦画为“下巽上离”。其《彖》曰：“鼎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亨饪也”（《周易·鼎·彖》）。“鼎”是三足炊器，用于燃火烹饪。“鼎”的功能是煮生为熟，变旧为新。“鼎”的大旨为更新、立新。“革故”必然“鼎新”，只有“鼎新”才算达到变革的目的。这便形成了《周易》的一大要义：“革故鼎新”。所谓“革故鼎新”就是去除旧的、过时的、失去生命力的东西，创造和建立新的、有生命力的东西。

《周易》蕴涵着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文化基因。《周易》认为事物发展达到一定限度，必要引发变革。《易传》从功能的角度给传统国人开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公式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。意为事物发展到极限，陷入困境，就须谋求变革创新；实现了变革创新，就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；而有了这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才可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。只有通过“变”，才能赢得“通”和“久”。只有变革创新，才能变原来的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

而为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变革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和动力。《周易》所说的“穷——变——通——久”是一个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不断持续的过程。变革创新促成发展，而发展到极致，按照《周易》“无往不复”、“否极泰来”的逻辑，还需要再变革、再创新。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断谋求变革创新，从而不断发展的创新发展观。《周易》“变则通”的思想是传统国人的基本信条。历史上的中国人每当感到发展陷入困境，耳边就会响起《易传》“变则通”的古训，从中获得启迪，勇敢地走上改革创新之路。

传统国人的创新意识在社会政治领域有突出的表现。《诗经》即有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）的诗句。意为周虽是小邦旧国，但却负有取代殷商，除旧布新的使命。《易传》宣称类似汤、武那样推翻旧朝，建立新朝的革命既顺应天道，又符合民意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；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（《周易·革·彖》）除了革命，传统思想家们更热衷于变法即改革。在从春秋到清末的二千多年中，变法的呐喊此起彼伏。商鞅变法言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（《商君书·更法》），“世事变而行道异”（《商君书·开塞》）。王安石变法称“圣人之心不求有用于天下，待天下之变至焉，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。”^①变法不是出于个人意愿，而是源于世事的变化。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变法运动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。不论成功与否，均具有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的内容。

在学术上，传统学人也有浓厚的创新意识。在先秦，孟子即言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后代的学者便将“自得”作为治学宗旨。程颐明确倡导“学莫贵于自得”^②。“学贵自得”就是要在学术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。而要在学术上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，就不能墨守成说，步人后尘。清初顾炎武认为，做学问最忌讳人云亦云，“《曲礼》之训‘毋剿说，毋雷同’，此古人立言之本。”^③古代学人不仅讲究“学贵自得”，而且奉“成一家之言”为学术理想。自司马迁提出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后，许多学者竞相效法司马迁，穷其一生，务求“成一家之言”。中国古代学人正是怀抱这样的学术志向，故在史学、哲学上有不俗的建树。

在文学艺术领域，传统国人的创新意识更为强烈。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，映入我们眼帘的是：诗词、歌赋、书法、雕塑、山水画，争奇斗妍；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各领风骚。中国古人在文学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，创造了极为繁富的艺术珍品，令人一唱三叹，流连忘返。这与他们自觉的创新意识有密切的关联。南朝萧子显认为，弃旧创新才有文学的繁荣“在乎文章，弥患凡旧。若无新变，不能代雄。”^④宋欧阳修将“新”作为好的艺术作品的标准“若意新语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为善也。”^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创新的氛围中，其创新才能自然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四、人有日新之命

推动创新，最紧要的是培育人的创新品格。儒家提倡“日新”，希望人具有“日新”意识和“日新”人格。儒家的“日新”虽侧重指人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的创新，但与现代创新精神高度契合。《周易》有“日新其德”的说法。儒家重要经典《大学》继承《周易》的“日新”思想，提出“三纲领”、“八条目”，将“自新”与“新民”作为教化的目标。所谓“三纲领”即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（《大学》）。按宋朱熹的解释，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”^⑥。“明明德者，所以自新也”^⑦。“明明德”是自我修养，自我更新，彰显天赋美德“新民”

则是革新人心和老百姓的见识道德,使民新,造就新民。从“自新”到“新民”,旨在培养新人,并使之达到“止于至善”的理想境地。所谓“八条目”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“三纲领”与“八条目”密不可分,其宗旨一以贯之。朱熹曾这样晓喻此理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者,明明德之事也;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者,新民之事也”^②。《大学》注重个人道德上的“自新”和普通民众的弃旧图新,已将创新的范围由政治和社会领域延伸到了人生领域,将创新的精神提升到了人生观的层面。《大学》在人生观的层面高扬“日新”,特别引了商汤刻在浴具上的铭文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(《大学》)。这是把除旧更新看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,要求人们具有“日新”人格,积极进取,日日除旧,时时更新,持续创新。

《大学》的“新民”、“日新”思想在后世有积极的回应。程朱一再表示,古本《大学》的“亲民”作“新民”解,强调对人的旧思想、旧观念、旧习俗等的更新和改造,“以去其旧染之污”^③。王夫之视“新民”为儒者的使命和责任,说“新民则必使家国天下之无不新。”^④许多仁人志士将“日新”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,以“日新”自勉,鞭策自己不断创新。唐诗人白居易以“日新”为座右铭,赋诗云:“千里始足下,高山起微尘;吾道亦如此,行之贵日新。”^⑤程颐追求在学问上不断创新,在修养上不断进步,说“君子之学必日新。日新者,日进也。不日新者必日退,未有不进而不退者。”^⑥

儒家倡导“日新”、创新,是以承认人的创造性为前提的。承认人具有创造性是儒家的一个基本预设。荀子的思想就具代表性。他虽然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,提出“性恶”论,但他对人并没有绝望,而弘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创造性。他用“伪”这个概念来表示人的创造性“可学而能,可事而成之在人者,谓之伪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认为这是一种人基于自己的心智和后天努力的现实创造性“心虑而能,为之动,谓之伪。虑积焉,能习焉而后成,谓之伪。”(《荀子·正名》)正是人的这种创造性,才带来了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“伪者,文理隆盛也。”(《荀子·礼论》)所以,他推重人的创造性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强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,就在于他实现了创造性“圣人之所以同于众,其不异于众者,性也;所以异而过众者,伪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

为了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,王夫之一方面讲“天地之化日新”,人置身于变化日新的宇宙洪流中,要体现宇宙的“日新”精神;另一方面将日新精神引入人性论,别开生面地提出了“人有日新之命”的命题。人缘何有“日新之命”?他作了多方面的阐述。从人性的形而上根源看,王夫之虽仍讲“天命之谓性”,但由于他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,变化日新的,所以在他看来,禀受天命之人性不是一次生成,而是不断生成,变化日新的“天日命于人,而人日受命于天。故曰性者生也,日生而日成之也。”^⑦他因此强调“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,故性屡移而异。”^⑧从人区别于动物的维度,他说“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。人则有人之道矣。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,人则有日新之命矣。有人之道,不堪乎天;命之日新,不堪乎初。俄倾之化不停也,祇受之牖不盈也。”^⑨动物只能利用天赋本能生活,人却有巨大的能动性,能够变革本能,不断改造人性,得到“日新之命”。王夫之不承认人性是人生之初就确定了的。他反问道“性也者,岂一受成形,不受损益也哉?”^⑩他以为人是“未成可成,已成可革”^⑪,可以变化革新的。如果把人看作是受生之际就已完全定型而一成不变的东西,那么,人和器物就没有什么不同了:“谓生初之仅有者,方术家所谓胎元而已”,“为胎元之说者,其人如陶器乎?”(《思问录·内篇》)王夫

之提出“人有日新之命”，是认“日新”为人的天命、人的本质规定。这是对儒家“日新”观的一大发展，并在今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因为只有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意识，使每个人都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，才会有社会的全面创新。

与儒家从历时态强调“日新”的旨趣不同，道家则从共时态凸显理想人格的与众不同。老子说“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。”（《老子·64章》）他心目中的圣人追求一般人所不追求的事物，学别人不学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异乎寻常、超凡脱俗的人格，也是一种创新性人格。古今中外，大凡创新人才都有超乎常人之处，他们与众不同的追求往往孕育着惊人的创新。只是模仿别人，肯定不会有创新。老子似乎已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他说“天下皆谓我大，大而不肖。夫唯不肖，故能大。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。”（《老子·6库》）大意谓天下的人都说“我”很了不起，不像任何人。正因不模仿人，追求与众不同，所以才能了不起。如果是模仿他人，那就只能渺小了。这种对与众不同的执着，十分有利于创新人格的养成。

综上所述，传统国人富有创新意识，其创新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蕴和独特的逻辑，并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传承不息，是推动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动力。当然这不否认传统国人有保守的一面，但保守并不总是消极的。创新与保守常常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两翼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互为基础，缺一不可。无创新，一个民族缺少活力，其文化难以发展；无保守，一个民族创新的优秀成果则难以累积，民族文化难以延续。重要的是维持二者的平衡。由于相对而言，创新难，守成易，所以人们一般更重视创新。古人亦如此。而我们今天发掘中国传统的创新意识，对于激发中华民族的创新基因，强化国人的创新意识，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
①金圣叹：《序离骚经》，《金圣叹全集》第3册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819页。

②孔颖达：《周易正义》卷首，《论易之三名》。

③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》卷4，《革》。

④王夫之：《张子正蒙注》卷7，《大易》。

⑤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》卷2，《复》。

⑥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》卷2，《无妄》。

⑦《四库全书总目·易类一》。

⑧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》卷6，《系辞下传》。

⑨王夫之：《张子正蒙注》卷5，《至当》。

⑩杨时：《王氏字说辨》，《龟山集》卷7。

⑪程颐：《周易程氏传》卷第3，《恒》。

⑫程颐：《周易程氏传》卷第2，《随》。

⑬程颐：《周易程氏传》卷第4，《革》。

⑭王安石：《王荆公诗注》卷41。

⑮康有为：《殿试策》，汤志钧编：《康有为政论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108页。

⑯王夫之：《周易内传》卷4，《革》。

⑰王安石：《夫子贤于尧舜》，《临川文集》卷67。

⑱⑲程颢 程颐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25。

⑳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19，《文人模仿之病》。

㉑《南齐书·文学列传》。

㉒欧阳修：《六一诗话》，何文焕编：《历代诗话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267页。

㉓⑳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大学章句》。

㉔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5。

㉕朱熹：《晦庵集》卷15。

㉖王夫之：《四书笺解》卷1。

㉗白居易：《续座右铭》，《白氏长庆集》卷39。

㉘㉙㉚㉛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》卷3，《太甲二》。

㉜王夫之：《诗广传》卷4，《大雅》。

作者简介：李光福，天津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教授、哲学博士。天津 300072

[责任编辑 刘慧玲]